

论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发起的在法义卖活动

李君娜

【摘要】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后，为动员国际力量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发起了在海外的义卖活动。法国是海外义卖的主要国家之一，与另一主要义卖参与国美国的义卖相比，在法义卖具有规模与成效较小、以官方接洽为主、快速实现了义卖物品免税入法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参与义卖的人物与地点密切相关。

【关键词】宋庆龄 顾维钧 义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与舆论的中心，聚集了许多的各界要人，他们依靠上海优越的地位和自身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来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救亡的活动，其中就有居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的宋庆龄。

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告英国民众书》等公开书信，表达中国民众抗战的决心与意义，并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在事变发生半月后的7月22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发起成立了旨在“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①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该会在成立前晚即将一批扇子、药品及六百余包药棉送交十九路军办事处^②，为前线将士提供了物资帮助。随着战争的继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上海分会等一系列抗日救国组织在沪上相继成立，宋庆龄亦参与其中，为援战积极奔走。

11月12日，日军攻入南市，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上海，上海沦陷，12月底，宋庆龄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离沪赴港。中国严峻起来的战争形势在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的同时，也对来自国际社会援助的需求日益迫切起来。

一、在法义卖过程概述

^①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页。

^② 《何香凝等筹组妇女救护慰劳团体》，《立报》1937年7月22日。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并被推选为将于2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会议开幕前，宋庆龄由香港致电大会，称“本拟参加星期六在伦敦举行之国际会议，但为与时局有关之职务所羁，未克如愿”^①，未能如期参会，转由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代替出席。顾维钧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各国以集体行动抵制日货，号召援助中国，取得了较好的国际反响。

宋庆龄因“与时局有关之职务所羁”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具体来说即是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经过几个月的准备，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在香港正式成立，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以宋庆龄寓所的客厅为办公场所。

至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民众一年多来的抗战在显示出极大抗战决心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对物质的需求则更大。

为筹集物资及经费，1938年底，宋庆龄以保盟的名义发起在美法等国的“慈善卖物会”。义卖会得到举办国民众的积极支持，美国友人哈斯克尔致函宋庆龄表示同意协助中国在美举办义卖会^②，法国“中国人民之友”协会^③亦来信说愿以展览及义卖中国工艺品的方式为中国募款^④。在国内，宋庆龄于香港成立了由六个妇女团体（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妇女兵灾会、妇女新运会、女青年会、中国妇女会、保卫中国同盟）组成的美法慈善卖物筹委会。筹委会成立后在国内积极征募义卖物品、宣传义卖活动并联络运送、展览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募，委员会征集到了瓷器、书画、服装等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成绩异常美满”^⑤。

在国内积极组织筹划的同时，宋庆龄更与在国外相关人士积极联络沟通，以期增强义卖的助力。在法国卖场方面，宋庆龄主要联系了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

① 《国际和平运动昨日在伦敦开幕讨论援助问题》，《晶报》1938年2月13日。

② 《致哈斯克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③ 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由50多个法国和平团体组成，社长赫礼欧，法国社会急进党总裁。该社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多次举行集会，呼吁抵制日货，向国际联盟大会、法国政府上书，要求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号召为救济中国难民捐款，仅据1938年9月初的数据，捐款即达50万法郎，捐赠人数达2万余人。1939年初帮助保盟主持在巴黎举行的义卖活动。德国侵占法国后，与保卫中国同盟失去联系。

④ 《致顾维钧》（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⑤ 《美法慈善卖物会今在港预展征品》，《申报》1938年12月17日。

1938年11月21日，宋庆龄致函顾维钧，说道：

“我们希望：您与法国友人仁慈地合作，容许他们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义卖；您和顾夫人，及知名的法籍中国之友担任赞助人。这样会吸引众多人群，会保证成功，并有效地宣传我们的宗旨……何时寄出（义卖的）物品，由何船运载，容后奉闻。这些物品是在香港的所有中国妇女捐赠的。为了避免上税，这些物品将直接寄到尊处。The Messageries Maritime（法国邮船公司）将免费为我们运送。^①”

从信可知，在宋庆龄看来，若要使在巴黎的义卖会取得成功，顾维钧是重要人物。他可以凭借其驻法大使的身份连接法国各友好人士与团体、扩大义卖会的宣传影响力，并为义卖提供实在具体的帮助。

12月7日，顾维钧就11月21日的来信回复宋庆龄道：

“对您为救济我国战争难民而作出的高尚努力谨致谢意。在法国，我们已在为同一目标工作。举行了几项活动。和美国、英国比较，这里只有少数人能象上述两国一样进行施舍；虽然募集并送往中国的数目不大，但也表达了法国对中国的普遍的同情。考虑到目前为救济中国战争难民的中国物品义卖会正在举行，因此到下一年早些时候方可举行另一次慈善义卖，这样，我们可以有时间准备并有足够的间隔以重新引起兴趣。

按照我们的经验，美丽的物品能卖得好价格，从而增加义卖的收益。能否告诉我，您何时可以发出义卖的物品？^②”

在回信中，顾维钧叙述了法国义卖的基本情形，亦为将举行的义卖出谋划策，表达了对义卖的高度热情与支持。而实际上，由于顾维钧的奔走与争取，中国所有运到法国的义卖物品均获得了免税，隐形的增加了义卖的收入。

到1939年4月，宋庆龄再次致函顾维钧，写到：

“得知义卖的箱子已转交中国人民之友社的Etienne Constant夫人，非常

①《致顾维钧》（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②杨天石：《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485页。

感谢^①”

可知，至 1939 年上半年，由于宋庆龄和顾维钧间的成功接洽，再加上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的积极配合主持，义卖物品已免税进入法国，为义卖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由于法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较大规模的义卖会并未如预期展开，只开展了几场规模较小的义卖会，大批义卖物品滞留在法国。到 1948 年，经中国驻法大使努力，这批物资由法国运回上海。6 月 3 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华懋大厦，为筹集儿童福利基金将这批物品义卖，共得 39.7 亿元法币（约合 3000 美元）^②。

从宋庆龄与顾维钧的往来信函中，我们可以略窥法国义卖的足迹，同时亦可知宋庆龄在国内参与了义卖的筹备，又为义卖在异国他乡的开展积极接洽，在海外义卖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具体到法国的义卖，由于宋庆龄的接洽，使得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加入了义卖的行列，为义卖的开展提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促进了义卖在法的顺利开展。

二、在法义卖的诸特点

在宋庆龄为海外义卖接洽的往来信函中，除了与顾维钧为在法义卖往来的三封函件外，亦有为在美义卖与美国相关人士往来多封信函。观览这些信函，可稍感法国义卖的特点：

第一，宋庆龄在为在法义卖接洽的过程中，以争取官方力量为主，即主要联系的人为顾维钧。顾维钧（1888. 1. 29—1985. 11. 14），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1904 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外交，1912 年回国。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而声名鹊起，1932 年 10 月至 1941 年 7 月为中国驻法代表。卢沟桥事变后有记者在法询问其对中日关系的看法，顾维钧“答词至为坚决，谓中国固爱和平，但不愿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中国准备抗战到底，不容有日本特殊权力的问题”^③，坚决抗战到底，因此，顾维钧在法除了积极争取法国官方的援助外，亦出席一些民间的筹募活动，如 1938 年 6 月中国著名古玩商卢

①《致顾维钧》（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5 页。

②杜淑贞主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③《顾维钧在法谈我决抗战到底》，《立报》1937 年 10 月 31 日。

君为中国红十字会筹募而举办的拍卖会^①。其夫人亦在巴黎劝募得六千元汇往香港^②，更在1938年3月28日为中国红十字会募集捐款，在法要人多受邀参加，“来宾均纷解囊捐款，为数极为可观”^③，为中国的抗战积极活动。宋庆龄在海外义卖计划开始后即在法国方面联络顾维钧，顾凭借其中国驻法大使的身份成为连接中国方面及法国义卖主办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的重要一环，为义卖在法国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扩大了影响。但阅览宋庆龄为在美义卖接洽的函件，中有两封是宋庆龄写给哈斯克尔先生、有两封是索耶小姐写给宋庆龄的，信中提及了义卖物品免税入美、在美义卖负责组织等基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斯克尔先生为热心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友人^④，索耶小姐则为美国援华会的成员，两人均无明显的官方身份。

第二，与在美义卖相比，在法义卖的规模、成效更小。在美国，主持、参与义卖的主要有美国援华会、中国人民之友社，期间，宋庆龄更致函哈斯克尔先生希望其能与美国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及李国钦博士取得联系，邀请两者参与义卖会，因为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的塞巴斯蒂安·艾尔夫人等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会对正在发起的义卖给予帮助^⑤，而李国钦博士“懂得中国古玩，能带领许多富有的收藏者来参观展览”^⑥，因此，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能对义卖有所助益，宋庆龄都积极促成联系。从义卖物品来看，虽然运往美国义卖的物品具体信息未可知，但从往来信函中可知美国是宋庆龄心中海外义卖的希望之地。1939年3月索耶小姐在致宋庆龄的信中写到“如此巨大数量的一批货物以‘国际优惠’为理由获准免税进口，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做到这一点更困难了”^⑦，再加上，1938年12月宋庆龄致函哈斯克尔先生时道：“我们正在法国和伦敦进行同样的努力以募集资金，但是，最有价值的物品将送到纽约”^⑧，

① 《我驻法古玩商拍卖艺术品》，《申报》1938年6月3日。

② 《顾维钧夫人募捐款六千昨转港汇抵沪》，《大美晚报晨刊》1938年4月10日。

③ 《顾维钧夫人招待外宾》，《大美晚报晨刊》1938年3月30日。

④ 《致哈斯克尔》（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⑤ 《致哈斯克尔》（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⑥ 《致哈斯克尔》（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⑦ 杨天石：《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⑧ 《致哈斯克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可知,运往美国的义卖物品量多质优,透视出宋庆龄对美国义卖成功的热切期盼。而在法国,负责并参与义卖的主要团体似乎只有中国人民之友社,参与义卖团体较少;虽然运往法国义卖的物品具体信息也未可知,但顾维钧在1938年12月致宋庆龄的信中写到:“和美国、英国比较,这里只有少数人能象上述两国一样进行施舍;虽然募集并送往中国的数目不大,但也表达了法国对中国的普遍的同情”^①,可知,在法义卖的成效不如美国的义卖成效大,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与在美义卖相比,义卖物品迅速免税入法是法国义卖的亮点。义卖物品能免税进入义卖主持国可以增加义卖的收入,有助于实现筹集募捐的目的,因此,除了与义卖主持国接洽义卖负责团体外,义卖物品免税入境是接洽的另一重要问题。在义卖物品运往美国前,宋庆龄曾致函哈斯克爾告知,为了避免上税这批物品将寄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胡适,但当物品到达美国时却因税务问题被海关扣留了,至1939年4月,胡适仍在为义卖物品免税入美努力,援华会等团体亦为此积极奔走,宋庆龄更为此与国内美法慈善卖物筹委会联名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发送求助信,希望罗斯福夫人能就免税问题出面调解^②。义卖物品免税入美并不顺利。而在法国,由于顾维钧的斡旋,1939年前后义卖物品就已实现了免税入法。

三、在法义卖诸特点形成原因

通过宋庆龄与顾维钧间的信函往来,实现了在法义卖的良性接洽,呈现了义卖在法国展开的大致轨迹,透视出在法义卖以官方力量接洽为主、实现了高效免税入境、成效较小的主要特点。然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并非偶然,与义卖开展全过程中的参与人及参与地密切相关。

1. 宋庆龄、顾维钧等义卖过程参与人的个人因素。宋庆龄(1893.1.27—1981.5.29),二十世纪举世闻名的伟大女性,1893年1月出生于上海,1907—1913年在美求学,1915年10月与孙中山结婚,在孙中山逝世后于1927年8月离沪赴苏,1928年5月初离苏赴德,期间在7月和9月与宋子安两次结伴出游巴黎。1929年5月初离德经苏回国,9月21日“为料理委托法国某公司制造孙

^①杨天石:《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

^②《保卫中国同盟的义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期,第21页。

中山铜像等事，离上海乘法轮士劳斯号赴法国”^①，事毕后于 10 月到柏林，至 1931 年 7 月下旬因母丧回国。纵观解放前宋庆龄在海外的大致足迹，可知其曾较长时间居住在美、苏、德，其中在美时间最长，其后依次是德国^②和苏联，而法国只是短暂停留，更说不上存在任何情感上的羁绊。而宋庆龄因留美六年而“友人极多”^③，她结识了许多美国朋友的同时也积淀了对美国的情谊，因而在在美义卖的过程中宋庆龄能几乎完全通过民间力量接洽义卖、并将质优量多的义卖物品送往美国并非偶然。另一方面，在法国义卖过程中顾维钧的个人能力是出众的，使得宋庆龄以官方接洽为主成为可能，并顺利高效的使义卖物品免税入法。顾维钧 1932 年 10 月出使法国，至 1937 年已驻法 5 年，抗战开始后顾维钧即在法国积极活动以图法援，逐渐推动了印度支那运输通道的总体畅通及其过境税的减免、中法军事合作等重大问题的实现，可见其不仅心怀祖国，更有出色的活动能力。而反观同时期的驻美大使胡适，顾维钧认为其“缺乏作为国家官员的经验。他是个学者，本来并不想担任大使的职务……他甚至发表过一个公开声明，不仅使我，恐怕也使整个中国外交界为之大吃一惊。他在声明中宣称，他当大使有三件事不干：（1）他不从事任何宣传活动；（2）他不介入采购武器、弹药事务；（3）他不参与需求贷款和信贷的工作……这正是外交工作中三件最重要的事项”^④。可见，胡适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外交官员的正常工作，更毋庸说为义卖物品免税入美积极有效的活动了。

2. 美法两国参与义卖团体的数量及其与官方的关系。在美国，参与义卖的团体主要是美国援华会和中国人民之友社，但宋庆龄和美国援华会都还曾试图使美国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加入义卖会，可见美国义卖会有寻求扩大义卖参与团体的愿望，使得在美义卖参与团体相对较多，再加上义卖物品品质优量多，义卖会的规模较大、效果较好。而在法国，义卖会主要参与团体似只有中国人民之友社，宣传及影响力有限，使得义卖规模与效果都打了折扣。再则，美法两国义卖相关团体与官方的关系也对义卖产生了影响。美国义卖虽然参与团体多但团体之间并不

①刘家泉：《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7 页。

②1930 年宋庆龄在德国就争取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问题与德国民主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1931 年春夏又在德与德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妇女运动领袖克·蔡特金及德国著名进步作家、艺术家、教授等广泛联系，商讨推进世界和平民主进步事业，并在柏林参加“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的活动，与众多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作家及德国共产党员联系。

③刘家泉：《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2 页。

④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70 页。

和谐，与官方的沟通也并不十分顺畅。就义卖物品免税入美一事而言，固然与驻美大使胡适在美活动不足有关，可援华会与中国驻美大使馆无法携手为免税事宜共进也使得义卖物品入美曲折。美国援华会成员索耶小姐曾在1939年3月致宋庆龄的两封信中写到：“我们很遗憾，未能尽早打通我国国务院。不过，面对贵国大使馆的请求，我们将事情全部扔给他们，似乎是轻率的。从大使馆得到任何信息都是很困难的”^①，“从胡适博士的秘书那里，我们得到口头保证，大使馆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有影响的朋友去打通我国国务院，但是，贵国大使馆的代表强烈要求我们不要主动做什么”^②。信中的文字表达出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和美国援华会对解决免税问题的关注，但两者对解决免税问题的具体方案没有统一意见，大使馆虽然一力承担了解决免税问题的重任，但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去解决，援华会虽然试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却受到了来自大使馆的掣肘，无所适从。而在法国，免税入法的顺利解决固然与顾维钧出色的活动能力有关，但顾维钧与法国义卖会负责团体，甚至法国民间友好团体的和谐关系都使得其在中法两国团体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相关活动积极开展。1939年4月宋庆龄在致信感谢顾维钧将义卖物品成功转交中国人民之友社的同时写到：“附寄备忘录一件，当地‘中国工业合作’（CIC）促进委员会要求转给您，希望得到来自您的信息与合作”^③，可见，顾维钧与法国民间组织的关系是较融洽的，使得官、民能携手共进，最大程度实现共同的目标。

3. 美法两国不同的国情。法国的国情与不断变化着的局势对义卖产生了影响。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后法国人民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给与了中国一定的援助。中国驻法大使馆时常收到来自法国民众的捐赠物品，一位法国姑娘甚至将订婚戒指捐给了大使馆，顾维钧对此感慨道：“虽然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却象征了法国老百姓的普遍态度。在欧洲各民族中，法国人大概是对国际主义事业最为敏感的，而这个例子正好清楚地反映了法国人民的普遍感情”^④，而法国议会中亦曾建立起法中友好团体。法国民众对中国援助的热情使得民间支援成为可能，

①杨天石：《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②杨天石：《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③《致顾维钧》（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④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5页。